

传统庙会的精神价值

——以顺德均安“帝王出游”为例

□甘子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顺德 528333)

[摘要] 通过对顺德均安帝王出游活动的考察,发现传统庙会以其公平性原则,建构起“我们”的存在,揭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因而,传统庙会在当代不是单纯的享乐和休闲,而是依然具有密切地联系着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满足本地居民的情感诉求,建构本地居民的意义世界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传统庙会;精神价值;帝王出游

[中图分类号] C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671(2016)06-0030-06

均

安镇地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西南部,位于西江下游东西水道的分口处,三面临江:西南临西江干流海洲水道,隔江与江门市新会区荷塘、棠下镇相邻;东南与中山市小榄、古镇隔河为邻;东北临西江东海水道与杏坛镇相邻。均安全镇总面积为8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0.9万人,流动人口约5万人,下辖8个居委会和5个村委会。每年农历九月初四到九月十九日举行的“帝王出游”,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项活动历时久,覆盖面广,参与者众多,是均安民众最为重要的社群活动之一。本文拟以均安“帝王出游”为例,就传统庙会的精神价值做一探讨。

一、均安“帝王出游”活动

笔者于2015年10月16日前往均安镇对“帝王出游”活动进行实地调查。本次调查除了对“帝王出游”活动本身的关注外,特别关注本地居民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诉求与精神寄寓。

帝王出游中的帝王为关帝和侯王。关帝为大家

熟悉的关公,侯王为都督平浪晏公侯王。据《顺德县志》(附乡庙)记载:“武帝(二并在甘竹,一江尾朝市坊。一三华,与晏公同祀,明洪武间建。)”^[1]据此,均安三华村的帝王古庙,应是在明洪武年间。(本地人却说是:明万历末年(公元1619年),在三华村鳌峰山麓建帝王古庙,同祀关公与侯王。这一说法也出现在一些本地文化介绍类的书籍中,如《名镇均安》等。笔者暂未掌握确切的证据可以佐证这一说法。)当时,江尾(即今均安)深受江河海浪之苦,所以,庙内同祀关公与都督平浪晏公侯王,以祈神灵保佑乡民水途平安。清咸丰元年(1851),附近五条村筹建扩建帝王古庙,命名为五股庙。五股庙建成后香火鼎盛,到庙拜祭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现存帝王古庙内的一石刻(时间不详):“庙内及头门石地,严禁贮物、焙茧、打禾、晒谷,如违,任人散取,并行议罚。五股公禁。”从中似乎可以看到,当年庙前公共用地上,常年有各种用途,但五股庙的主事们显然不赞成这些用途,因而公议禁止。五股庙理事会决定每年农历五月初四至十二日为庙会之期,关帝在

[收稿日期] 2016-10-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佛山神庙剧场研究”(15YJA751006);顺德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顺德庙会研究”(2015-YB2)。

[作者简介] 甘子超(1978~)女,河南信阳人,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十三乡（均安）巡游九天，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以祈驱邪消灾，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后来，人们认为农历五月正适逢雨季，影响庙会的举行，于是将活动改为农历九月初四至十二日举行：初四起驾，出三华，经豸浦、上村、福岸，在张氏大宗祠歇宿；初六起驾，离沙浦，经豸浦、菱溪，在陈家祠歇宿；初七起驾，离菱溪，经太平圩、南面、外村，在冯氏大宗祠歇宿；初八起驾，离外村，经渡江、矾头，在李家祠歇宿；初九起驾，离经桥头，入沙头，在黄氏大宗祠歇宿；初十起驾，离沙头，入仓门巷心，在李家祠歇宿；十一起驾，到仓门土庙，在松隐欧阳公祠歇宿；十二起驾，离仓门，经均安圩、三华，回銮古庙。清末，随着江尾洲十三乡原居民迁居至新的沙田区新华、天连，帝王出游的覆盖范围随之调整，出游日期也扩展至九月十九日。帝王出游活动曾因历史原因中断过几十年，1987年，均安旅外乡民与本地民众捐资重修供奉关帝、侯王的帝王古庙（五股庙），复兴“帝王出游”这一记载留存均安乡情忆记的传统活动；每年农历九月初四至九月十九的出游，均安全民参与、海外游子必定归来，共同参与这一均安乡土上不可缺失的民俗盛事。2014年，“帝王出游”（关帝出游）被列入顺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帝王出游包括四个程序：

起宫，即由四代同堂的长者手捧关帝、晏侯神像，放入銮舆。

巡游，即帝王銮舆巡游均安，所经之处，接受乡民摆设的三牲、果品拜祭。

座宫，即帝王銮舆巡游至某村，晚上到该村祠堂歇息，接受乡民的拜祭。

回宫，即帝王巡游完各村后，返回三华帝王古庙。

神像出游要绕行均安（目前均安十三个村居中，仅有南沙尚未纳入巡游路线，另，沙浦、星槎两村选择在正月巡游），一般需经过村中主要街道，村中的大小祠堂是非常重要的地点。所到之处，村民均设香烛摆设祭品以祀。

巡游仪仗队伍仿效古代帝王出巡的形式：先以头锣敲响十三下开道。两面头锣分别由锣手以一根旗杆打横抗在肩上，金锣在锣手身前，锣手身后是一面金黄色大旗，旗帜上印有“金锣”二字，旗杆头处插有一束黄皮树叶。每面锣都印有所属锣鼓柜

的名称。锣鼓柜是用花缕木做成的亭轿式、装饰华丽、可移动の木柜，里面摆放着敲击、吹奏、拉弦、弹拨类民族乐器。锣鼓柜原本是由人抬着，现在基本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一班曲艺乐手围绕跟随吹奏，组成一个演奏班底。今年的头锣分别属于“陶情小筑”和“游艺山房”两家锣鼓柜。头锣之后，三丈高的“圣军司令”黑色大旗紧紧跟随，之后是“坚持改革开放”“户户直奔小康”的黄色旗帜，时代感十足。随后的彩旗队迎风飘扬，色彩鲜艳，接着是“污秽勿近”、“肃静”、“回避”、“威武”等牌匾。后面还有两面迎风招展的黄色三角大旗，上面分别绣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几个大字，表达人们朴实而美好的愿望。按照传统本应是穿黑衣黑裤腰系红绸的壮士们，现在这一形式有所简化。他们按照所代表的不同村落，身著统一颜色的T恤。巡游队伍均头戴草帽，帽子上插有黄皮叶，帽子和T恤上均印有锣鼓柜名称或本村坊的名称，有些还印有赞助企业的名称。如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三华村，就是统一身着大红色T恤，非常喜庆热闹。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抱着类似戏台上关公所用的“青龙偃月刀”等以壮声势。巡游队伍中，一面大旗上绣有本方阵所代表的村居的名字：“三华”，随后的是本村的锣鼓柜，后面则是由妇女组成的行香队伍。出游当天清晨，行香妇女（主要是村中的中老年妇女）在神像路经之处，每隔一段路程，便放置一束点燃的香。这叫做“开香路”。按照习俗，帝王出游当天，结婚超过一年的女性，上身穿专为帝王出游而设的T恤，下身穿出嫁时的红裙，俗称“媳妇裙”，作为跟神的行香队伍。跟神行香的妇女一律跟着本坊的锣鼓柜，每人手中都拿着一炷由黄皮叶包裹着的香。而结婚未满一年的“新媳妇”，则要穿着出嫁时的整套龙凤褂裙（顺德本地习俗是出嫁时的龙凤裙褂只在结婚当天穿一次），在夫家所属祠堂内，等候帝王到此坐宫。她们在帝王銮舆来之前，摆开祭品，上香祭祀。当帝王銮舆来了，新媳妇需手捧纸元宝跪地迎接，接着化宝（即点燃元宝）祈福。

随后，两面三角形的大旗上绣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罗伞队伍紧随其后。罗伞色彩斑斓，上有“百鸟朝凤”、“八仙过海”、“麻姑追舟”等精美的刺绣图样，并镶有小镜子，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闪，金碧辉煌。由八个膀圆腿粗的青壮年抬着的，关帝、晏侯端坐的两个銮舆的到来，是

巡游的高潮部分。銮舆为雕刻精美的小木楼，上有重檐歇山顶式的楼顶，刷金色漆。所到之处，鞭炮齐鸣，烟雾缭绕。銮舆手们更是不时有节奏地上下颠动銮舆，大声吆喝，在人群中掀起一重又一重热烈的回应。

游行队伍足有几里长，一路上香烟袅袅，爆竹声声，锣鼓阵阵，歌声悠悠；乡民与游人两旁站立，争相观看巡游队伍。巡游队伍经过之处，很多村民把私家供奉的神像请出，接受帝王的巡视，希望熏染到主神的灵性，增加私家神灵的法力。他们还在路旁或门口摆设金猪、鸡鹅、糕点、生果、茶水等迎驾，招待巡游队伍和行人，以表慰劳之情，一些人家还会给巡游队伍发放“利是”（即红包，金额不等）。巡游队伍或游客，渴了累了，随手可拿饮料食物，顺便与村民聊一聊帝王出游的精彩之处，人与人的隔阂顷刻间消除。

二、帝王崇拜

（一）关帝崇拜

关于均安的关帝崇拜，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宋朝末年，一驿丞背着关公灵牌来到南方供职，把关公供奉于驿站内。乡民们敬重关公的忠、义、仁、勇等精神，纷纷到驿站拜祭。这个传说，把时间设在宋末，可能与关帝崇拜演变史有关。关公是“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从宋代开始，关公封号累叠累加，一共有19次。^[2]宋以前，关羽还只是关羽。三国至隋唐，关羽的主要价值是忠勇，《三国志》里把关羽张飞并提：“皆万人敌也”；在关羽战死的荆楚之地，据（清）张镇的《解梁关帝志》记载：“802年董挺的《贞元重修庙记》：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3]。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唐贞元年间，关羽仍是蜀将军，之所以有遗庙在此，是因为他战死此地，人们害怕，“盖鬼有所归，乃不为厉”^[4]。这个形象与后世关公的形象有很大差距。黄华节在其所著的《关公的人格与神格》中，认为关公崇拜发端于北宋。有宋一朝，一直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因而“宋代朝廷对正统、礼制、华夷问题看得特别重。”^[5]所以，读《春秋》、扶正统的关公的“义”符合时代需要，由地方性神灵渐成国家性神灵。至明万历年间正式封帝，使关公承担起“度一切众生于梦幻后，存千秋大义在天壤

间”^[6]的重任。均安关帝崇拜传说把时间设定在宋末，应与这一大背景相关。而在传说出现的“驿丞”，在宋朝并没有这个官职。明、清始设，最有名的驿丞莫过于王守仁。《清史稿·职官志三》：“驿丞，掌邮传迎送。凡舟车夫马，廩糗庖饌，视使客品秩为差，支直於府、州、县，籍其出入。”^[7]从这一点来看，均安关于关帝的传说应是明清之后出现的，均安的关帝崇拜至少应是在明之后开始的。

（二）晏侯崇拜

帝王之“王”，是晏侯。晏侯究竟是谁，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公姓晏，名戍仔，江西临江府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疾恶如探汤。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无知乎？’其为人敬惮如此。大元初以人才应选入官，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奄然而逝，从人敛具一如礼。未抵家，里人先见其扬马导于旷野之间，衣冠如故，咸重称之。月余以死至，且骇且愕，语见之日，即其死之日也。启棺视之，一无所有，盖尸解云。父老知其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显于江河湖海，凡遇风波汹涌，商贾叩投所见，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坚牢，风恬浪静，所谋顺遂也，皇明洪武初诏封显应平浪侯。”^[8]清代学者赵翼在其《陔余丛考》记载：“时毗陵为张士诚之将所据，徐达屡战不利。太祖亲率冯胜等十人往援，扮为商贾，顷流而下。江风大作，舟将覆，太祖惶惧乞神，忽见红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谁也？’默闻曰：‘晏公也！’及定天下后，江岸当崩，有猪婆龙在其下，迄不可筑。有老渔人教炙猪为饵以钓之，瓮贯缙而下，瓮罩其项，其物二足，推拒不能爬于上，遂钓而出，岸乃可成。众问老渔人姓名，曰：姓晏。’倏不见。明祖闻之，悟曰：盖即昔救我于覆舟者也！’乃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9]明代加封之后，晏公即为水上航运保护神。均安地处岭南水乡，三面环水，早年易受洪涝之灾，居民出入又多靠船只，因而，信仰晏公在情理之中。

帝王同祀，而“晏侯”崇拜又是在明代之后兴起的，这也旁证了均安的关帝崇拜至少应是在明之后开始的。

（三）民间多层次信仰的融合

把关帝、侯王同祀，让跨越儒释道三家的关帝与道教的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同时巡游，这种多层次信仰的融合，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元性。这

一点在顺德民间比较普遍。仅顺德县志记载，本地乡庙就有天后庙、武帝庙、大圣古庙、雷将军庙、狄相公庙、感应祠、刘公庙、元君古庙、北帝庙、真武庙、温佑靖公祠、棣萼古庙……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顺德县志》（清）有志可查的庙宇应在200座以上，供奉的神灵还各不相同。目前，根据顺德区民间信仰场所普查组2015年普查（普查报告尚未公开发布），顺德十个镇街现有各类民间信仰宫庙614座，信仰对象主要为观音、关帝、北帝、天后娘娘、龙母、华光帝等，各地宫庙的神灵诞期均有祭祀、祈福等活动，每年吸引过百万善信民众参与。这种信仰方式，被西方人韦伯称之为“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10]，显示了中国民间信仰体系的复杂多样，兼容并包。

三、传统庙会的精神价值

“一切传统只有在对今天或者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时，它才获得了价值。”^[11]在今天的均安，帝王出游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活动，依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意义。它密切地联系着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满足着本地居民的情感诉求，建构着均安人的意义世界。

（一）公共性原则

均安“帝王出游”活动从筹备到举行、从心理到具体仪式都贯穿着公共性原则。

祭祀的公共性。抬在肩上的关帝、晏侯是地方社会集体的主神，是本地的精神中心。对关帝、晏侯的崇拜是公共意识的投射：人们敬仰关二爷的忠义，期盼借助他的忠义仁勇去除邪僻，保佑平安，人们相信凭借晏侯的力量可以河晏海靖，免受洪涝灾害。人们拜祭关帝、晏侯，表达的是一种集体性的诚意、敬意，人们期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是为集体祈福，是公共的愿望，与平常人们礼神拜佛重在表达私人愿望，期望神灵庇护个人利益有着明显的不同。

其次，活动的组织上，也体现了公共性。均安的“帝王出游”活动现在由均安镇政府主办，各村均有专人主事，人人参与。在各宗族庙宇内均张贴着写满姓名和金额的红纸，虽然人们捐款数额有大有小，但参与的广泛性可见一斑。一些在外工作的人们，需要提前请假回来参与活动。人们尽心尽力地参与这件事，表达了自己的公共意识和集体精神。同时，也隐含着原始的民主意识和公平原则：

你只有为公共祭祀活动做出了贡献，才有可能获得神灵的赐福。“帝王出游”这一公共性活动，又为大家提供了增强联系的机会。几乎笔者采访过的所有的活动参与者都承认，他们平时因忙于工作或其他原因导致与村邻关系并不十分亲密，现在通过参与这项活动，与同村人、同宗人关系更加密切。

娱乐的公共性。均安“帝王出游”活动几乎等同于民众的假日。人们走出门来尽享欢愉。本地民众认为每逢“帝王出游”活动举办时，比过年还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晚上宗族还会聚会，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作为祭品的均安烧猪在这几天会销量大增。以美味食品献祭神灵是原始祭祀的传统。现在，均安人通常以宗族为单位，在献祭给神灵后共同聚餐，均分烧猪，既表示人们受到神灵的福佑，又能够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二）内在自我的相通：“我们”的存在

“帝王出游”不是单纯的享乐和休闲，而是民众以切身实践来体验一种“神圣”，以此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既能安顿个体精神，也能建构社区共享的意义价值。

在零距离观看“帝王出游”的过程中，笔者仍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并没有融入到“他们”中。以录像形式记录帝王出游时，进入镜头的有“帝王出游”“活动的参与者，有虔诚的上香者，有与笔者类似的观赏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事后重新观看照片或视频时，图像中每个人脸上的神情明确地告诉别人：我是谁。也即是当“帝王出游”这件事发生时，这一特殊时空中，巡游者在成员未必彼此完全相识的前提下，建构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群”。在“帝王出游”活动中，几乎所有参与活动的人们不分年龄、不计男女、不论知识水平的高低，人人都是快乐的、善意的，人际关系得以润滑。为什么“帝王出游”这类活动能够成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人们通常把原因归结为：活动促使大家都走出门来了。但是，为什么活动能够促使大家走出门来，这个问题很少人触及，或是简单归之传统：本地多年来都这么做，习惯了。

在大家认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背后，我们看到，促使大家走出门来建构起这个“群”的，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相通的情绪和意识。这一“群”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依循他们共同认定的文化规范，完成

了“帝王出游”这件事。同时，也向不能参与这项活动或旁观活动的人们宣布了“我们”的存在。人群关系发生变化，边界就此产生。“我们”是一个群体，“群”意识使原来的社会结构变得模糊，平时塞滞的人际关系如邻里关系得以疏通，新的社会结构得以重组。这个新的社会结构并非与原来的社会结构相对立，也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而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如平日里的长幼、兄弟、亲友、邻里、同事、上下级等之间的关系以另一种形态表现。

这种形态的形成，源于参与者的内心、内在的状态（interiority）。人们参与“帝王出游”这类活动，并不关注自己是否从中获得什么物质利益，也不需要去对“帝王巡游”活动追本溯源。人们关注的是“我”参与了，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内在。通过参与活动形成互动关系，在互动过程中，使个人的内在自我与他人的内在自我相沟通，建构起一种新的集体性，有效地解决人的内在问题。

这也是笔者在参与此类活动时的切身感受。身在现场的笔者明确地感受到，自己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细思之，“帝王出游”活动进行时，笔者和活动参与者虽然都在场，但当活动客观发生时，对于笔者的内在主观意识状态所产生的印象和对于他们内在主观意识状态所产生的印象显然是不太一样的，尽管我们都参与、都对活动有一定的认知。具体而言，笔者的参与是：在活动的现场，尽可能客观记录活动的发生。他们的参与是：全身心的投入。笔者对活动的认知是，跟随巡游队伍前行，了解活动的发生。他们的认知则是一种体悟。他们或积极参与巡游、或在家门口燃放鞭炮、摆好香案迎接帝王的检阅、或身着“媳妇裙”跪迎帝王、或虔诚地期盼、等候帝王銮舆在自己家里或自家的商号多停留一会（当然，这个不是随便停留的，一般都是在事前与活动方提前沟通好，且有所捐献，帝王銮舆才会进入）……他们带着对关帝和侯王的敬畏之情，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内在情感，将个人的内在自我与“群”中他人的内在自我相通、相连接，个人与个人情感交汇，由此融入集体中，赋予集体性新的意义，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

（三）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人情与面子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文化中的成员在社会化过程

中被教导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共存于文化成员之中。^[12]中国文化价值观通常是指产生于先秦的诸子百家时代、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的、至今仍对中国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那些核心价值观^[13]。其中，台湾大学的黄光国提出“人情与面子”模型为大家所熟知^[14]。在中国人的社会情境中，特别是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人情与面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办什么事情（哪怕是丧事），都希望场面热热闹闹。

均安的帝王出游活动中，八音锣鼓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符号。锣鼓柜的参与，使帝王出游阵容更大、声威更壮。在中国古代，鼓乐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器乐，一般用于祭祀和战争。高亢的锣鼓声很容易调动起公众的情绪。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中，隐藏着的是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也即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面子、礼数、人际关系。锣鼓柜的加入，响鼓大锣所营造出来的声势，再配以连绵不断的鞭炮声，色彩艳丽的罗伞，表达出来的正是本地民众对待外在的一套经过浓缩的意义与情感。均安“帝王出游”活动本身是对古代真实的帝王巡游的模仿。历代帝王较大规模的巡游除了安境靖边、查风问俗、以及帝王本人热爱的游山玩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扬威显盛。例如秦始皇巡行郡县，即有“以示疆威服海内”的目的^[15]。隋炀帝一下江都时“舳舻相接，二百余里”^[16]；西巡张掖、北巡突厥时，创制“观风行殿”，盛陈文物，设鱼龙曼宴，招待少数民族首领，更具有明显的夸耀富强、张扬威德的意图。均安“帝王出游”活动亦如是。同时，各村居的锣鼓柜参与巡游队伍，多少也带有夸耀、比试的心理。整个巡游过程，有几十个八音锣鼓柜参与。（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均安现有锣鼓柜35个，分别是新华的华乐新屏、永乐新屏、添园锣鼓柜；仓门的耕馊啸咏、华泰民安、胜龙新声、紫云山馆、陶情小筑、雅颂声流、游艺山房、南洋雅詠；三华的虞韶伺响、升平雅颂、文明雅颂、锦文雅颂、升平雅奏、和声鸣盛；多浦的同音共庆；天连的雅乐仙馆、笙歌同乐、盛世升平、沙涌文艺；上村的群声雅颂；南面的北极；外村的詠游雅趣；矾头的棣萼声华；桥头的农詠新声；南浦的庐山群乐、同乐韶歌、虞韶风化、和声鸣盛、恒庆山房、文明雅颂、群贤雅趣；沙浦的鸣盛铜台。这些拥有这古雅名字的锣鼓柜是帝王出游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村各坊均有代表本村的锣鼓

柜,条件较好的村锣鼓柜数量较多。每个巡游方阵高举旗标,上标注八音锣鼓乐社名称,以表明方阵所属村坊。巡游时,锣鼓柜乐器设备、锣鼓点的娴熟程度、外在装饰等都属于人们谈论的话题。而乐手们更借机炫耀技法,以示本领。“在社会关系中

角色责任的实现,建立和维持人际和谐、促进团体财富和福利的增长是东方人幸福感的核心。”^[17]获得人们交口相赞的锣鼓柜,会为本村居增添荣耀,带来更多的面子,从而获得由衷的幸福。 ■

The Spiritual Values Of Traditional Temple —— Taking "Imperial Parade" of Shunde Jun'an as an Example GAN Zi-chao

(Shund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Shunde, Guangdong 528333)

Abstract: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existence of "we", revealing the cultural values of "w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Shunde Jun'an imperials' inspec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fairness principle in traditional temple. It is concluded that, traditional temple is more than just for pleasure and leisure in modern society, they connects closely with the daily lif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local people, to meet the emotional demand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construct the major value of their spiritual world.

Key words: traditional temple; spiritual values; "Imperial Parade"

【参考文献】

- [1] 顺德地方志办公室. 顺德县志(清咸丰、民国合订本)[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496.
- [2] 吴幼雄、李少园. 关圣帝君历代封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9.
- [3] [清]张镇. 解梁关帝志[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165.
- [4] [清]梁章钜.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93.
- [5] 王见川, 皮庆生著, 路遥主编.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 宋元明清[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3.
- [6] 梁申威, 赵淑琴. 关庙楹联大观[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1: 68.
- [7]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8]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2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88.
- [9] [清]赵翼. 陔余丛考[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 774.
- [10] 查尔斯: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 第1卷[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2: 110.
- [11] 刘魁立. 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 序言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6
- [12] 杨中芳. 中国人真是集体主义的吗? ——试论中国的价值体系 杨国枢主编, 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M].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1994: 321-392
- [13] 肖水源, 杨德森. 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测量: 理论构想[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2, 11(3): 347-349.
- [14] 黄光国. 人情与面子: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李亦园, 杨国枢, 文崇一编. 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M].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1985: 125-153
- [15] [汉]司马迁. 史记·秦始皇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6] [唐]魏征. 隋书·职官志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7] Lu L, Gilmuour R. Individual-oriented and socially oriented cultural conception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scale development[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 36-49.

【责任编辑 谢明俊】